载沣使德述论

李志武

(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600)

摘 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因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克林德事件,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专使往德国谢罪。这是清朝第一次派亲王出洋。出于报复心理,德皇在礼仪问题上刁难载沣使团。德皇要求坐受国书,醇亲王行三鞠躬礼,且参赞随员须向他叩首。清朝方面不堪受辱,为此与德国方面多方交涉转圜,最终在勉强挽回清朝面子的基础上礼仪之争得以解决。在整个使德过程中,载沣表现的民族气节、才能及谦逊赢得了中外舆论的高度评价。

关键词:载沣;使德;义和团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3)01-0086-07

一、使德缘起:克林德被杀事件

克林德(Ketteler)(1853-1900年),德国人,男爵,外交官。来华曾任广州北京等地领事官。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起担任德国驻华公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身为公使,却无视国际公法,于五月十七日(本文采用夏历纪年),亲率德国军一队,非法拦击和逮捕过路团民。次日,克林德更为猖獗,又率一队德兵四处寻衅,看到团民练武,即发令开枪,打死团民约20人。五月廿一日,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沽炮台。五月廿五日,清廷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说明八国联军强占大沽炮台,显然是各国故意失和,中国政府对各国使馆不再保护。限令各国一切人在24小时内必须离京。当夜,各国公使联名函复总理衙门,请求宽缓离京期限,并要求次日上午九时回答。第二天一早,克林德不等到九时,便乘轿气势汹汹到总理衙门抗议。当他行经东单楼时,正好遇上载漪神机营章京恩海率队巡街,在枪战中克林德被杀。这就是"克林德事件"[1]。

克林德被杀是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它促使中外矛盾进一步激化,也使得清廷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特别是在对德关系上[2]。克林德事件后,德国派出重兵,扩大侵华规模,德国皇帝亲自到威廉港誓师,激励德军:"必须我德国之国旗悬于北京城上,比满洲政府俯首就我范围而后矣。"[3]使得德士兵群情激昂。这是个赤裸裸的侵略演说,在德国内也很不得人心。德国议院后来在攻击德皇与政府中提到,"德皇在军队来华之际在威廉港的演说,持论过激,真不啻命士兵以虐杀中国人也"[4]。当时不少报纸及时人的笔记都认为德兵在华行动尤其暴虐,与此不无关系。而且在后来的议和中,德国以此事对中国多方勒索刁难,并作为议和中一个很重要的砝码。德国再三强调:"本年五、六、七、八等月,即光绪二十六年四、五、六、七等月间,在中国北方省份,酿成重大祸乱,至罹穷凶极恶之罪,实属史册所未见之事,殊悖万国公法,并与仁义教化之道,均相抵牾。其情尤重者,即五月二十四日克林德之事"[5]。在庚子年底所缔结的十二款议和大纲中的第一款就写明:"原任德国大臣被害一事,钦派亲王专使前赴德京,代表中国皇帝国家惭愧之意,遇害处所树立铭誌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用辣丁、德、汉各文,列叙中国皇帝惋惜此等凶事之旨"[6]。

二、出使人选的确定

对于专使的人选,德国特别指意醇亲王,德使照会说:"奉德主训条,中国若派醇亲王前来通好,当优礼接

收稿日期:2002-12-05

作者简介:李志武(1971-),女,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待"[7]。清廷便按照德国的意旨于光绪廿七年(1901)四月廿三日,授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德国谢罪。当时清朝有众多的亲王,为何独选年仅十八岁的醇亲王载沣作为出使大臣,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李学通认为清朝接受《议和大纲》后,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默即派参赞向清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催问,并提出要醇亲王载沣作为专使。清政府便安排载沣与瓦德西见面。瓦对载沣非常满意,也认定是载沣[8],这里应有误。瓦氏 1901 年正月 20 日之日记中描述:"今日主要之事,大部分为余与中国亲王周旋。最初在我们使馆之内,来此者计有当今皇帝之兄弟三人,以及堂兄弟一人。彼等系骑马而来,随带无数侍从;此四者皆系极为温雅之少年,举止优美,面貌聪俊。彼等穿得齐齐整整,其毛辫之美丽,尤特别惹人注目。彼等表示一种极有训练之礼貌。彼等极喜欢钢琴音乐,尤其是联军军乐。因其中年纪最长者,亦不过十有八岁之故,所以实际上只算是一种儿童时会。其中年纪最长之一人,似将被派为前往柏林谢罪大臣。余相信彼必为吾皇所喜悦。按此系指 kungjuan 亲王而言,但其后实际上所派之大使,则为醇王"[9]。从译者的注释中可以知道,瓦德西根本就不认识载沣,而其实载沣本人长相才干如何,对于德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载沣的身份。李学通认为,德国之所以选定载沣是因为:一是载沣是光绪帝的胞弟,地位较一般亲王显要,否则不足以表示中国政府谢罪的诚意,以此在精神上给中国以尽量沉重的打击和羞辱。二是因为载沣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莫赞一词",与事件没有什么牵连,既不象庄亲王载勋、端亲王载漪等积极参与进攻使馆。这说法很有道理。笔者认为德国之所以属意载沣为谢罪专使,或许还有其更居心叵测的一面。当时自从义和团前发生立储事件后,光绪帝之后的皇位继承者一直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议和后,慈禧所立的端王之子大阿哥溥儁无疑已被废,而载沣当时的地位其实和载儁其实差不多,同属道光帝的孙辈,无疑是热门人选。因此,载沣也是很有可能有成为清最高统治者。如果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的话,则德国屈辱中国更甚。

关于跟随载沣出使的人选的确定也是一件颇费劲的事情,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利益牵扯。自从确定载沣作为出使人选后,"一时禀请随往者,日不乏人",但载沣比较老练,都推说:"年少不敢自主,须凭两全权大臣酌定去留"[10]。其实,随使人员并不完全由奕劻、李鸿章确定。两大臣以醇亲王年纪尚轻,交涉事宜阅历甚少,需要有张翼、荫昌等得力之员赞助。便谕令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副都统荫昌均著加侍郎衔随同载沣出使德国[11]。除此之外的随员大多由载沣奏调,这可从载沣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的奏折中看出,里面包括有梁诚、刘宗桂、麦信坚、象贤、曾广镕、尚希曾等重要人员[12]。

最后确定的全部人选是:侍郎衔前内阁学士张翼为参议,侍郎衔正白旗都统荫昌、记名直隶候补道梁诚为头等参赞,候补道麦信坚为二等参赞,浙江候补道刘祖桂、道员用直隶候补知府王琎为三等参赞,江苏补用知府治格、侯选知县杨书雯为二等翻译官;江苏补用知县严璩、后选知县唐家桢为三等翻译官,象贤、曾广镕、尚希曾、丞缪为随员,李树藩、李士鉴为学生,王应瑞为医官,姜沛霖为供事,头等护卫三员,二等护卫二员,三等护卫三员,骁骑校一员,八品首领太监一名,太监一名,八品衔亲军一名,八品衔匠长一名,请发一名,成衣一名,苏拉一名,马夫一名,武牟一名,跟役一名,随使洋员三名:参赞、大德国总兵官李希德尔、大德国驻华武官劳诃、北洋水师总管轮巴士[13]。据此,可知出使人员包括载沣在内共有 42 人。

关于人选问题还有一个有趣的传闻。柴萼《庚辛纪事》中记载,和约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充谢罪使,大臣们都觉得大损国体,但苦于无力拒绝。有人便向慈禧太后献策,择年貌与醇亲王相似的代替出使。太后认为可行。刚好有一个剃头匠,状貌酷肖亲王,很难辨认真假。便教剃头匠各种礼仪。剃头匠到了德国后,从容应对,酬酢尽欢,恰如其分。但是后来给间谍得知,告知德皇,德皇大怒。但是他又怕追究起来,事情给其他列强知道后会讥笑德国受骗,便强忍不发[14]。这则野史记载的谬误不值一驳,却多少反映朝野认为此事不光彩的心理以及国人多少带有的阿 Q 心理。关于此次屈辱的出使,时人的报纸都避重就轻,大谈醇亲王出使德国对中国变法大有裨益,说:"出使虽朝廷不得已之举,然不但友邦可藉此辑睦,即外洋之事亦可周知,外洋之情亦可洞悉,将来事毕还京,嘉谟入告,必有足勷朝廷之听者。新政之转机当于醇亲王是赖矣"[15]。

三、礼仪之争

载沣出使是清政府第一次派亲王出洋,无疑是近代中外关系史中的一件重要事件。所到之处,皆引起轰动。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起程,十月初六日登火车北上回到北京,历时四个多月。期间所经历的主要波折是礼仪之争。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对于载沣出使的各种礼仪中国方面可以说是颇费周折,而德国方面却欲借此给清政府更大的精神打击。当载沣一行到达苏伊士运河波赛港时,柏林与北京、西安之间开始为会德皇的礼仪问题电报往还,争持不下。不少中西报纸报纸对于礼仪之争一事的报道均是以讹传讹,比如说"德皇竟欲强王与其随从向之跪拜"等[16]。都与事实不相符合。

应该说德国方面在礼节问题上存心刁难。出使前,吕海寰多次向德国方面询问会见礼仪,但德国方面均无任何表示。直到七月初六日载沣已船到波赛之时,德国礼官才通知吕使。吕立刻告知枢垣:"顷探得德主在白厅坐见醇亲王,行三鞠躬礼,参赞随员如见须叩首,彼云此是谢过,非常时觐见,海寰力争之,不允,请旨以便告之醇亲王"[17]。载沣则在七月初九日得到消息。其日记中说:"知德皇所定觐见事宜,有参随跪叩一节,此为中外所无,当即图应付之策以全国体"[18]。

德国当局此一决定,实属不平等外交待遇,清廷起初不能接受。尊照西安政府的意旨,奕劻、李鸿章在七月十日致电吕海寰,拒绝德国对谢罪专使参赞叩首之要求,军机处于七月十三日致电全权大臣吕海寰:"中国惩罪赔款,久已诚心谢过,特派亲王出洋,本欲重修旧好,今德国于各项礼节,出立御座,并于纳陛上赐坐,此中国非常异数,今醇亲王与亨利实为敌体,乃德主坐见尤于邦交之礼未协,务望设法电达德外部,切实力争为要"[19]。七月十七日清廷特命奕劻、李鸿章请托英美日商请德外部,改变德皇接见醇亲王及参赞的礼节。

载沣这边也煞费苦心筹划。驻德华使多方营谋,运用了外交手段和私人关系,例引中西礼节相争。在其著述《庚子海外纪事》有详细的记载。七月十二日载沣一行至德国与瑞士交境的巴塞尔。十四日会见在即,德国方面仍坚持原议。七月初十日,载沣便以身体不适为辞,在巴塞尔停而不前。而任期已满的吕海寰也并未向德廷辞别,去拜见载沣,为此事从长计议。且吕海寰深谋远虑,他自己避居瑞士,暗授参赞赓音泰和金楷理去办事。此外载沣也委托同船的李希德为之斡旋。

起初德皇威廉二世态度坚决,不肯更改礼节,据说当得知克林德被杀,德皇盛怒,扬言:"必须中国派钦差至我面前磕头方算了事"[20]。使德参赞赓音泰七月十二日致行在军机处电,"德皇以戕使为欺慢德国太甚,恐难挽回。"在七月十三日载沣拟去柏林之际,德皇拒绝接见载沣等人,使载沣在巴塞尔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西安方面的清廷七月十八日电知吕海寰与德外部再行磋商,"总以磨得一分是一分"。但同时又让步:"如实在不能挽回,应与照会议明,此次专使原为道歉,姑为通融酌允,以后仍按照各国通行之礼,不得援此次为例"[21]。

其实在清政府内部其实是有分歧的。西安清廷不满的是德皇坐受国书。而奕劻、李鸿章方面则认为,坐受国书尚可容忍,而参赞跪拜绝不能同意。李鸿章在1896年应邀赴德时,德皇也是坐受国书,因此李认为德皇生性傲慢,不用去计较。在七月十三日两大臣致电吕使提出折中方案,主张让载沣觐见德皇时,只带翻译荫昌一人,其余参赞或托病或暂避他处,避免与德皇见面。直到西安政府方面在七月十八日有所妥协的时候,两大臣还在七月十九日致电吕海寰提出修改方案,要载沣觐见时只带金楷理、赓音泰两人,并要吕仍"设法磋磨"[22],同时奕劻、李鸿章以此为理由对已经商议就绪的《辛丑条约》拒绝签字,向各国施加压力。据报道两大臣对于各国代表说:"我醇邸奉使至欧洲,实为力敦睦谊起见,岂料德皇视为谢罪之使臣,欲令王与各随员行跪拜礼,强人所万不能行之事。故草约亦不能画诺也"[23]。载沣则和两大臣的观点相一致,他比较在乎跪拜礼节。报纸渲染:"闻王等声称宁蹈西海而死,不甘向德皇跪拜"[24]。载沣曾提出将觐见礼节改为请安,但是又与向例不符,没有得到清政府同意。

正当礼仪之争处于骑虎态势,有决裂的危险时候,七月二十日事情出现转机,吕海寰和德国驻巴塞尔领事艾事威先后通知载沣:德国外交部表示,德皇同意接见,呈递国书时只带荫昌一人作为翻译,免去跪拜礼,俱行鞠躬礼。当晚,载沣一行启程,次日抵达波茨坦。二十二日中午,载沣随带荫昌前往德皇行宫。载沣向威廉二世行三鞠躬礼,呈递国书,宣读颂词。荫昌同行三鞠躬礼。德皇傲慢地坐受国书,发表答词也没有起立,答词也措辞严厉。就这样载沣也觉得很满意了。他七月二十三日写给家里的信讲到:"大局保全,国体无伤。……接待尚优,沣奉我国诏书专使异邦,因参随跪礼,几有衅,幸而事有转机,竟成此典"[25]。其实从一开始德皇已经以一种很傲慢的态度来处理出使事件的。比如德皇要求载沣使团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觐见,致使清政府方面准备仓促。而且当载沣等到达德国后,德皇款待载沣住在奥莲格理行宫。按德国宾礼,凡是各国君王及近支亲胄来游,往往将其随从安排住在奥楞哲丽宫。而更可叹的是载沣等人不知道,载沣还欣喜的认为奥宫:"其雅洁极为可喜,闻前法皇拿破仑曾居于此"[26]。而且德皇虽然让步了,但是却心有芥蒂,载沣在谢罪之后,本来打算再往欧美各国访问,但遭到德皇阻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止,"醇王如往欧洲英意比各国,有违尊诚之意,"且"收礼尚在游移未定"[27],由于德国当局反对以及曾经热情要求载沣前往的英国、意大利在这个时刻又表示接待的事宜尚未决定(是否德国暗中运动不得知)。这使得载沣等处境十分尴尬。于是在与清廷方面商量后,以载沣有水土不服的症状兼要回去完婚为理由,向外宣布取消了前往他国访问的计划。八月十八日载沣一行,按照原路启程返回。

德皇之所以到最后作出让步,吕海寰认为是他暗向德教士学界鼓吹舆论;又拜托前津德国领事司根德在德皇召见时为此进言。司根德劝说德皇时举出的理由是,第一,跪拜是祀天、祀耶稣的礼节,如果令人跪拜是把对方作为木偶人对待,是一种侮辱对方的礼节;第二,中国官员对此礼节之事,因为国体颜面所在,很是在乎。如果逼迫太紧,恐怕他们会有性命之虞,引起别人对于德国非议,这就因小失大了。德皇听后,有醒悟的意思[28]。其实德皇之所以让步,应该主要归因于清政府不肯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德皇不想因小失大,才稍为让步。事实上,在载沣觐见德皇三天后,议和两大臣才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还值得一提的是,李岫认为德皇是借这次礼节之争狠狠教训了在觐见公使问题上长期不合作的清政府[29]。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因为清统治阶级有着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观念,外国驻华公使觐见中国皇帝的礼节问题是一个几十年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辛丑条约》中外使觐见问题得到了规范化和制度化。在这场礼仪之争中,清政府虽然委托他国驻华公使代为转圜,但他们都助德抑华,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看待这场争论。这应该说是对多年来在礼节问题上备受清廷压抑的一种报复。

四、对于载沣使团的评价

在载沣看来,这次谢罪他算是不辱使命。其实中国人在这件出使问题上一开始就大丢面子。克林德被杀虽然有清政府保护不周的一面,但是主要是克林德自己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执意要去总理衙门,且克林德在北京早已经是臭名昭著,坏得出名,克林德本人要负主要的责任。清政府的屈服也并非是理屈词穷而是在列强武力下屈服,不得不靠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来维持自己的腐朽统治。虽然清政府尚爱脸面,经讨论在致德皇国书中避免用"道歉",而用"谢枕"二字。而对于国人来说,这已对民族感情极大伤害。陈登原谈到:"克林德死后,德认为奇羞大辱,要求谢罪一也,谢罪时要求跪谢二也,谢罪后要求于我国首都建立牌楼,希图永远谴责中国三也。"陈并引用《新民丛报》卷第 14 卷的《国闻简评》针对驻俄公使杨儒暴卒,不久他的儿子也自缢了,传闻是被俄国人从楼上踢下致命一事的一个评论:"德公使之死遂致八国联军,神州为之陆沉,意国公使夫子途中逢群儿譁笑,亦劳明诏皇恐谢罪;钜鹿之乱法国教士受伤,吊慰之电稍缓,天津法国领事即相诘责,我国公使独非人也"[30]。可谓沉痛之极。不过,载沣顺利地完成这次使命,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首先,载沣表现了凛然的民族气节。对于载沣在义和团运动中没有随扈去西安,但有关他的活动却鲜有史料记载。当时很多留在京师的王公大臣受到了八国联军的虐待和侮辱。比如怡亲王载垣和克勤亲王。而侥幸逃过此难的景况也不好,生计潦倒,沿街贱卖金石顶及朝珠等物品[31]。瓦德西曾提到载沣等亲王当时藏匿在北京,到了议和后,他们才出来[32]。究竟有没有受苦则不得而知了。在剿杀洋人的问题上,他保持了沉默的态度,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勤政殿召见王大臣讨论开战问题时,载沣和其他亲王一道也恭听了懿旨,但是在整个事件中他"莫赞一词,尚守家教"[33],由此可见,载沣对待外来侵略者心怀仇恨,但是态度不激进。有一则载沣与在义和团运动后期,驻守醇亲王府日军笔谈录,颇可作参考。载沣与日本军曹的对话中有"城中惟日本军最有纪律,居民安静","日本兵驻扎我府中甚为安好","日本兵现在城中有几千人么?"[34]虽然这席谈话准确反映载沣对洋人的态度,但大抵看出他的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但绝不能说载沣没有民族羞辱感。在这次出使中的言论和行动,反映了载沣凛然的民族气节。这里主要表现在他对于地方迎接他的礼仪规格的低调处理。

载沣出使德国,是清朝第一次亲王出洋,载沣使团所途经的地方大员对此高度重视,而且在礼仪上也花费不少心思。但载沣却有自己的主张。在去途中,当载沣从天津出发抵达上海前,便已先饬上海道:"两宫蒙尘于外,本邸出使良非得已,诸事不求美备等。"因此载沣要求不要照《大清会典》上的隆重仪式来迎接他,而只是简单的仪仗。载沣的俭德不仅赢得了上海迎谒官绅士商的钦佩,而且外国官商兵捕也对他肃然起敬。舆论认为载沣扫除了中国贵人习气[35]。到达香港时,载沣也同样坚持了自己的主张,亲眼目睹了整个迎接过程的庄士敦有很详细的描绘,不妨照录:"1907 年 7 月 25 日上午 11 点左右,一个身着中国贵族华贵的丝绸服装,头戴清朝最高品秩的红色顶戴花翎,羞怯而略带孩子气的人,在香港登陆。在码头上,他和其他随从受到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英国官员的迎接。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我们代表当地政府欢迎他抵达英境。一对警察负责护从，挡住路旁好奇的神情冷漠的中国人，以使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示恭敬。4名红衣轿夫将他抬离岸边。15分钟后，他的轿子来到总督府门前。在那里，他受到皇家殖民地总督的迎接。在香港迎接他的是总督亨利·布莱克爵士。这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时刻，因为这是中国亲王首次登上英国的领土，然而，原本应由港英当局给予他的大多数正式和隆重的仪式，却被取消了。虽然这些礼仪是他十分乐意接受的。当他乘坐的德国巴伐利亚号船入港的时候，没有英军的敬礼致意，没有岸炮齐鸣欢迎；上岸后，亦没有仪仗队恭候他。这一切都是按他自己的意愿办的。因为，他此行肩负着一项耻辱的使命，在完成这项使命前，身为一位中国血统的亲王，他宁愿不讲任何排场”[36]。当时载沣只有十八岁，能有这种觉悟和老练实为难得。

对于德皇在礼仪上的刁难，载沣日记中虽然没有愤激话语，但是他以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需要补充的是，按照条约规定清政府要为克林德建碑。这个碑在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开始动工，（此碑现在今天的北京中山公园内。初始命名为“克林德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称“公理战胜”牌坊；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为“保卫和平”牌坊）。碑落成后，慈禧太后派载沣参加落成典礼，并由他亲自洒酒祭奠。据与载沣颇有往来的赫兰德目睹：“醇亲王双手托着一个中国古代祭祀时用的三角酒杯，醇亲王似乎是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是我所见的惟一一次”[37]。载沣对于克林德极其引发的事情的情绪可见一斑。

其次，载沣在出使中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载沣身为天皇贵胄从未出都门一步，现在却要乘风破浪出洋，对他而言既是挑战又是一次难得的开阔眼界的机会。当时慈禧已经下诏决定在中国实行变法，因此国人以及载沣自己对于此行另有期待，在上文说过，当时的舆论都对载沣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回来后，将所见所闻上达天听，对于中国的变法有所裨益。载沣自己也在出使前向慈禧感恩表明自己的打算：“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以期无负我皇太后，皇上委任之至意”[38]。而他到达境外华商也对载沣充满了期待。在香港逗留时，载沣接受华商邀请参加商会，华商代表冯紫珊上书一篇，希望载沣考察外国富强之道，回来后“奖派游学以育人才，保护版权而许专卖，倡奖商业以争利权”[39]。而到达槟榔屿时，福建补用知县何晋梯也上书表达类似的愿望[40]。而载沣也做到了言出必行，从他的日记可看出，他对于外情十分留意，在德国逗留期间，载沣参观了炮厂、博物馆、武备学堂、电机厂、船厂等地方。未能到美、日、意等国访问，使载沣十分遗憾。而且在归途中，载沣又顺便看视江南制造局和南洋公学，受到了国内报界舆论的好评。

再次，载沣以实际行动在国人、广大华侨外人面前树立了良好的皇族子弟形象。可以说晚清的贵族子弟甚少外出，对外界而言较为神秘。但由于媒介的报道，在国人印象中他们多是声色犬马，饱食终日之徒。载沣的出使使一般官员甚至百姓都可以一睹皇室风采，载沣每至一处，围观者都堵塞街衢。舆论对他的评价普遍突出他的“谦抑”“彬彬有礼”，与人的交往中应对得体。认为能有这样的亲王，实在是大清之福。上文提到在去途中载沣小留香港，到香港总督的官邸造访，总督夫人盛赞载沣：“态度谦恭可亲”，“才气横溢”[41]。而且连傲慢的德皇也对他甚有好感，破例赠送他头等红鹰宝星[42]，对于华人来说，载沣的良好形象使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中饱受摧残的民族自信心得以有一丝的慰藉，某种程度上对帝国也重燃一星希望。而外人对载沣的好感，也可以某种程度上促成有关交涉的顺利进行。

还值一提的是海外的保皇党人对载沣也有期待。《清议报》上刊登了署名梁启田的一篇文章《拟上醇王书》，要载沣在列强面前“力陈皇上失权之故，逆党篡弒之罪，使是非大明于中外。”并献策载沣“密联各国，稍藉他山之助，皇上可复位，逆党可尽除，新法可即行，中国可立救”[43]。不知道载沣是否看到了这篇文章，但是从这可看出，康梁等为了光绪皇帝的复位，试图拉拢光绪的弟弟等亲贵的计划可窥一斑。

载沣之所以能得体地完成艰难使命，顺利返棹回华，除了上文所提的吕海寰外对他出力颇多外，他的使团得力参议、参赞及翻译也是功不可没的。德提督李希德曾对载沣使团有评价，认为载沣“慎重外交，不辱君命”，张翼“既行谨慎，会晤德国官员应对有方，实为大员中所不可多见者”，荫昌“于德文极有学问，德人不但嘉其文词，而且羡其熟悉德国性情并武备事宜”、“一举一动亦属文雅，德皇见之，想必乐与周旋。遇有交涉事件，自然易于办理也”，梁诚“英文甚精，于办理交涉事宜亦极见长，识见亦甚精卓”。麦信坚“性情好静，语不轻发，堪称稳重”，随侍各员“各司其事，甚属妥善”[44]。但其中功劳最著的可算是梁诚。罗香林提到梁诚因为拒绝德皇威廉二世要醇亲王行叩头礼的苛刻要求，很得到英美舆论的赞许[45]。在光绪二十九年前驻美日秘公使伍廷芳，任期届满，梁诚继伍出使美日和秘鲁古巴等国的钦差大臣，其实对此公使之职伍与梁暗中有激烈的竞争。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都联电奏请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伍廷芳留任, 结果由于荣禄的保荐, 而梁诚得以成功。据张云樵推测因为荣禄与梁诚素无深交, 其保荐应该是受其女婿载沣的委托[46], 可见载沣对于梁诚在此次出使中襄助的感激。

参考文献:

[1] 苏位智、刘天路主编. 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3] 各国时事. 中国旬报[A]. 庚子年八月十五日.
[4] 各国时事. 中国旬报[A]. 庚子年十二月初五日.
[5] 孔祥吉. 德国档案中有关义和团的新鲜史料. 清史研究[J], 2000, (4).
[6] 陈志奇. 中国近代外交史[M]. 台北: 南天书局出版社, 1993.
[7] 丁山辑. 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选. 近代史资料[J], 74 号. 34.
[8] 李学通. 醇亲王载沣使德史实考. 历史档案[J], 1990, (2).
[9] 王光祈. 瓦德西拳乱笔记[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10] 贤王谦抑. 申报[N],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廿八日.
[11] 丁山辑. 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选. 近代史资料[J], 74 号. 34.
[12] 丁山辑. 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选. 近代史资料[J], 74 号. 37.
[13] 丁山辑. 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选. 近代史资料[J], 74 号. 40.
[14] 中国史学会主编. 义和团[Z].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 2000.
[15] 论醇亲王出使德国于中国变法大有裨益. 申报[N],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一日.
[16] 万国公报[N],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
[17] 丁山辑. 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选. 近代史资料[J], 74 号. 44.
[18] 载　沣. 醇亲王使德日记. 近代史资料[J], 73 号. 52.
[19] 吕海寰. 庚子海外纪事. 台湾: 文海出版社, 1988.
[20] 吕海寰. 庚子海外纪事. 台湾: 文海出版社, 1988.
[21] 丁山辑. 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选. 近代史资料[J], 74 号. 49.
[22] 吕海寰. 庚子海外纪事. 台湾: 文海出版社, 1988.
[23] 万国公报[N],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廿一日.
[24] 万国公报[N],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25] 丁山辑. 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选. 近代史资料[J], 74 号. 52.
[26] 载　沣. 醇亲王使德日记. 近代史资料[J], 73 号. 56.
[27] 丁山辑. 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选. 近代史资料[J], 74 号. 54.
[28] 吕海寰. 庚子海外纪事. 台湾: 文海出版社, 1988.
[29] 李　岫.《< 辛丑条约> 与晚清外使觐见问题》[A].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济南: 齐鲁书社, 1992.
[30] 陈登原. 国史旧闻[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31] 八泳楼主人. 西巡回銮始末记[M]. 台湾: 文海出版社, 1988.
[32] 王光祈. 瓦德西拳乱笔记[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33] 丁山辑. 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选. 近代史资料[J], 74 号. 53.
[3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Z].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35] 蔡尔康. 醇亲王奉使过沪图. 万国公报[N],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
[36] 庄士敦. 紫禁城的黄昏[M]. 陈时伟等译. 上海: 求实出版社, 1989.
[37] I. T. 赫德兰.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M], 吴自选、李欣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38]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义和团档案史料[z].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39] 来稿杂文. 清议报[N],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40] 申报[N],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
[41]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z]. 刘桂梁等译. 上海: 知识出版社, 1986.
[42] 载 洊. 醇亲王使德日记. 近代史资料[J], 73 号.
[43] 来稿杂文. 清议报[N],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一日.
[44] 载 洊. 醇亲王使德日记. 近代史资料[J], 73 号. 157.
[45] 罗香林. 梁诚的出使美国[M]. 台湾: 文海出版社, 1988.
[46] 张云樵. 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M]. 台湾: 联经出版公司, 1989.

On Tsai Feng's Mission to Germany

LI Zhi-wu
(*History Department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00,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Ketteler Event in the Boxer Rebellion, Prince Chun Tsai Feng was appointed special envoy to Germany in 1901 to offer an apology.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d sent princes abroaol. The German Emperor took revenge on China by making thinas difficult in the ceremony and propriety. The emperor demanded that he should remain seated while Prince Chun's counselors and entourages should perform the kowtow to him and Prince Chun present the credentials.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felt mortified at the demands and carried on negotiations with Germany. In the end, the dispute was settled by making a compromise and China could barely save face. Throughout the mission, Tsai Feng had showed his national intergrity, modesty and ability, which impressed the public deeply.

Key Words: Tsai Feng; mission to Germany; the Boxer Rebellion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